

移民与明清时期贵州的农业开发

李景寿

摘要：随着移民的迁入和中原农业技术的传入，明清时期贵州落后的农耕制度发生了彻底变化。明清时期移民对贵州的农业开发，以水稻品种的激增为标志，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河流沿岸一带首先得到了开发，然后又以玉米等域外农作物及本土杂粮的推广为标志，山区渐次得到了开发。

关键词：移民；贵州；水稻；玉米

中图分类号：K248 **文献标识码：**A **文章编号：**1006-2335(2014)04-0016-05

明代卫所屯田、贵州建省和清代贵州改土归流，加速了贵州内地化的进程，而大量中原移民的到来，在引入中原传统农业技术的同时，促进了贵州水稻种植的发展和玉米等域外农作物、本土杂粮在山区的推广。

目前，学术界对明清贵州经济史的研究，侧重于探讨明代的卫所屯田、明清时期贵州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开发等问题，而关于移民对贵州农业开发问题则探讨得较少。因此，本文拟从移民引起贵州农耕方式变革及农作物传播的角度，探讨明清时期移民对贵州的农业开发问题。

一、中原农业技术的传入与本地落后农作方式的改变

贵州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，直到明代当地众多少数民族的农作方式仍然较为原始。甚至移民入黔之初，也由于受贵州特殊地形、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一度放弃了原先精耕细作的农作方式，转而选择了粗放的农作方式。对此，史载：“明初设流官，中原人士稍稍民

之，初变其俗……元以前无税亩，明始征秋粮。然欲清丈不得。盖地多硗确，复削山而耕之。一易再易，三易菜田等说不得而加之。耕山者宜新垦，新垦者草少，久之积莽生焉。复辍不耕。”^[1]（卷二十二《风俗》）显然，这非常符西周时期中原地区“田莱制”的特征。移民的耕作方式尚如此落后，众多少数民族农业生产的落后程度便可想而知了。其中，有些少数民族甚至尚外于渔猎阶段，如明代如铜仁府的“杨黄”人“男不耕女不织，出则执雀萝，以渔猎为业。”^[2]（卷三《风俗·铜仁府》）

不过这种落后农作方式，随着移民的增多和中原农业技术的传入而逐渐发生了变化。而这大概又源于牛耕的推广。

自古以来，贵州少数民族大多饲养着牛、马等家畜，但大多不将其用于农耕，如明代金筑司的克孟苗和牯羊苗“耕不挽犁，以钱馗发土，諠而不耘。”^[3]（卷五十九《诸夷·苗人》）此外，程番府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农业生产中也不用牛耕，如史载：“岁时杀牛祀鬼，击腰鼓为乐。耕不用牛具，以木锹播殖。”^[2]（卷三《风俗·程番府》）

李景寿，男，历史学博士，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，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。

清代,随着中原移民的迁入,牛耕日益受到重视,如道光时期遵义府的百姓甚至普遍认为:“农之本在牛强”。^[4](卷十六《农桑·农具》)后来由于牛耕的普及,人们日益重视耕牛的饲养问题。对此,史载:“黄牛畏寒,水牛畏热,牯牛喜触斗。母牛爱眠,息饲之,当其时审其方冬欲热时,鏹以谷豆籼糠,夏秋之间饮以汗水,沃草以盐汤,以取其凉。毋令饮水,饮之则馘,久之则虺。若耳根湿,湿其牛无病。耳燥鼻干,水莫倦啻是必病也,即按方治之。”^[5](卷四《食货志·农事》)

后来,秧马也传入了贵州并逐渐得到推广。如道光时期,遵义百姓已经使用秧马了。对此,史载:“吾乡治秧田,刈戎菽等密布田内,用秧马践入泥,俟烂,则播种,其力倍于粪,且不蠹。秧马制,以纵木二,为端蓄四,横长倍广,下旁杀令上平,如足榻状。底如四履齿,用柔条一,或绳贯两端为系,高接手踏时,足各履一马,手提系,缓行茎叶好,深陷之,名踩青,甚便且速。”^[4](卷十六《农桑·农具》)

此外,移民传入贵州的生产工具还有龙骨车、牛打脚等,农具则还有蒲辊、犁辕、捷耙、浪耙、水耙等。^[4](卷十六《农桑·农具》)

显然,这些由中原移民传入的牛耕等中原农耕技术,直接改变了贵州原先落后的农作方式。

二、水稻品种激增与河流沿岸的农业开发

明清时期,源源不断进入贵州的移民,大致首先定居在土壤肥沃、灌溉条件较好的河流沿岸一带。移民定居这些地方后,根据各地气候和自然条件,先后从内地传入或培育了许多水稻品种。因此,水稻品种的激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流沿岸地区农业开发的状况。

明代,封建中央政府对贵州的农业开发以卫所屯田为主,移民数量还相对有限,许多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河流沿岸尚未得到开发。因此,由于移民迁入数量的不同,各地农业的发展也出现了差异,主要表现在有些地方水稻品种增多,而有些地方则尚未增多。例如,弘治时期贵

州宣慰司由于移民较多,风俗内地化的特征很明显,如史载:“士君子秀而文,其氓勤而务本,人多气节,不异中州。文教丕振,风气和平,不喜争讼,乐于恬退。”^[6](卷一《贵州宣慰司上·风俗》)由于稻种植较多且水平较高,这里开始出现了香稻和匾稻两个品种。^[6](卷一《贵州宣慰司上·土产》)此外,程番府移民也比较多,风俗内地化的特征也较明显,如史载:“八番子者,服食居处与汉人同。”^[6](卷八《程番府·风俗》)同样,由于水稻种植较多且水平较高之故,这里出现了香稻、一枝箭两个水稻新品种。对此,史载:“香稻,郡田膏沃,故多佳稻。炊之香白异常。一枝箭,附地而生,叶如牛膝,背有白毛,能愈疮疡。”^[6](卷八《程番府·土产》)

相反,移民迁入较少的地方,由于缺乏内地先进水稻种植技术的推动而尚未出现水稻新品种,表明这些地方的农业开发进程较慢。例如,都匀府一些少数民族的糯稻种植历史比较悠久,而且早已形成了以糯稻为主食的饮食习惯。对此,史载:“平州、烂土等处四时常暖,土宜糯,恒炊食之。”^[6](卷八《都匀府·风俗》)由于没有大量移民迁入,这些少数民族原始的风俗保存较完好。对此,史载:“人重廉耻,勇于战斗,治丧不用浮屠。俗颇竞利,地多岚瘴。出入戴笠,夷俗恶陋。”^[6](卷八《都匀府·风俗》)因此,其糯稻种植的水平普遍较低。对此,史载弘治时期都匀府“土产”有“芝麻、杨梅、韭、檀木、紫竹、海棠、方竹、厚朴、枳壳”,^[6](卷八《都匀府·土产》)显然,糯稻未被列入当地的“土产”之中。

这说明,虽然都匀府的糯稻种植历史较悠久,甚至还是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的主要粮食作物,但由于迁入的移民较少,内地先进水稻种植技术尚未获得推广,致使这里的糯稻种植既少量的扩张,更无质的变化。因此,在这种糯稻既没有地域特色又没有出现新品种的情况下,也就未被列入当地的“土产”之中了。

清代,早在康熙、乾隆时期随着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完成和大量移民的迁入,贵州内地化的进程明显加快。这些移民进入贵州之后,大多首

先定居在河流沿岸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。由于灌溉条件便利,这些地方的水稻生产很快发展起来,导致水稻品种迅速增加。例如,贵州东部、东南部的思州府,明代早、晚稻合计才有九个品种,即杉板红、六十日、白露早、班稠糯、香禾米、猪毛糯、洗杷早、金吾钗糯、罗裙带。^[7](卷三《田赋志·土产》)康熙时期,思州府的水稻品种已增加到了十三个,其中早稻四种:六十日、白露早、洗杷早、麻粘四种,晚稻九种:香根糯、绿稠糯、黄匾糯、都匀糯、香糯、红谷糯、红毛糯、过冬青、矮筒禾。^[8](卷四《赋役志·物产·谷类》)贵州西南部的安南县,雍正时期共有七个水稻品种,即黑粘谷、白粘谷、黄毛谷、红毛谷、黑毛谷、黄糯谷、红糯谷^[9](卷二《物产》),光绪时期已经增加到了二十一个品种,即黄波粘、白粘、北风粘、冷水粘、矮粘、黑毛谷、瓜粘、羊瓜粘、银梗粘、黄毛谷、红毛谷、扫帚谷、早稻、晚稻、黄糯、白糯、红糯、矮脚糯、黍糯、猪屎糯、六谷米^[10](第三编《乡土格致·一物产》)。

明代,在少数民族众多而农业生产条件又较差的永宁州,数量有限的移民不仅未将当地的少数民族内地化,他们反而被当地少数民族化土著化。例如,这些移民普遍“人性强悍”、“牧羊为产”^[6](卷十六《永宁州·风俗》)。由于普遍只适宜种植大麦、苦荞、黄稗,当地少数民族历来“酿大麦、苦荞、夷稗为酒”^[6](卷十六《永宁州·风俗》)。受其影响,这些移民也只种大麦、苦荞。对此,史载:“风气刚劲而多寒,故铧稻难艺,卫人所资以生者惟荞、大麦而已。”^[6](卷十六《永宁州·风俗》)然而道光时期,随着移民的增多和生产经验的积累,永宁州不仅已经种植水稻,而且还出现了多个品种。对此,史载:“稻,有药、白、糯、早各种。又羊毛黏,米粒坚细,春白如玉。”^[11](卷五《食货志·物产》)

三、本土杂粮及玉米等域外农作物的推广与山区的农业开发

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原本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,不仅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较落后,而且还表现为杂粮种类较少。因此,明清时期贵州农业生产的发展,还表现在随着移民的

增多和扩散,本土杂粮及玉米等域外农作物的推广。

明代,贵州一些移民较多的地方杂粮种植已较普遍。例如,在普安州一些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,由于移民较多,居民风俗内地化的特征较明显。对此,史载:“尚文重信,军卫戍卒多系中土,习俗相沿,崇礼让,士习诗书,农勤稼穡,服食居处与腹里无异。”^[12](卷一《輿地志·风俗》)这里种植的杂粮种类较多,主要有梁、粟、稷、大麦、小麦、燕麦、甜荞、苦荞和豆等。^[12](卷二《食货志·土产》)再如,铜仁府由于移民较多,居民风俗内地化的特征也较明显。对此,史载:“山川秀特,风土爽垲,力本右文,士知向学,郡属各司汉夷杂居,有土錡苗仲,种类不一,习俗各殊,迨今渐被华风,洒然变易。”^[13](卷二《方輿志·风俗》)同样,其杂粮种类也较多,主要有梁、黍、稷、大麦、小麦、甜荞、苦荞、黄豆、绿豆、红豆、赤扁豆、白扁豆、刀豆、蚕豆、豌豆、茶褐豆、胡麻、苏麻等。^[13](卷三《食货志·物产》)

相反,在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或山区,杂粮种类就很少。如永宁州慕役长官司“所部皆白罗罗也……酿大麦、苦荞、黄稗为酒,不舂缩筒吸而饮。”^[6](卷九《永宁州·风俗》)再如,乌撒卫一带“铧稻难艺,卫人所资以生者惟苦荞、大麦而已。”^[2](卷三《风俗·乌撒卫》)显然,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还较落后。然而,和如此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明和清前期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却较发达,如明嘉靖时期的乌撒卫“土人多牧胡羊,岁两取其毛以为毡而资贸易焉。”^[2](卷三《风俗·乌撒卫》)还有,清乾隆时期普安州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“多高山,有水草,利养马……故罗罗民人家多畜马。”^[11](卷二十二《风俗·畜牧》)

不难发现,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山区的永宁州和乌撒卫,杂粮的种类都明显少于中原移民较多的地方,而这一类地方的畜牧业却往往比较发达。若再结合有些少数民族尚处于仍渔猎阶段的情况来推测,则可能意味着明代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不仅杂粮的种类较单一,而且种植面积也较有限。

清代,早在平定贵州之初,清政府就鼓励人民开垦无主荒地,发展农业生产,如顺治六年(1649)时清政府下令:“……察本地方无主荒田,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,开垦耕种,永准为业。”^{[14](P348)}顺治十五年(1658)时,贵州道御史李秀又建议朝廷鼓励垦荒。对此,史载:“迩来田土荒芜,财赋日绌,臣以为劝垦荒田之典不可不隆。其州县土民暨现任文武各官并闲废缙绅,有能捐资开垦者,请飭部从优分别授职升用,则不烦帑金之费而坐收额课之盈。”^{[15](P2)}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,大量荒地逐渐得到开垦。

此后,康熙、乾隆时期随着贵州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完成,移民再次大量迁入贵州。由于人口激增,在河流沿岸得到较充分开发的情况下,农业开发逐渐向山区推进,本土杂粮和玉米等域外作物随之也推广到了这些地方。对此,史载乾隆四年(1739)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:“向来新疆地方,小麦、高粱、小米、黄豆、脂麻、荞麦等种,素不出产。自安设屯军之后,地方文武设法劝种杂粮,今岁俱有收获。”^{[15](P581)}此后,清政府又再次在山区推广杂粮种植,如乾隆五年(1740)大学士九卿会议:“山土宜广行垦辟,增种杂粮。查黔省山土既多未辟,收获惟恃稻田。应如所议。凡有可垦山土……至劝民随时播种杂粮之处,应令地方官酌借谷种。”^{[15](P900)}

玉米虽然是一源自美洲的域外作物,但早明代在黔北一带就已经种植了,如绥阳:“山间民只种秋禾、玉米、粱、稗、菽、豆、大麦等物,俱不知种黍、稷与小麦。”^{[14](卷十六《农桑·农候》)}由于玉米较其他农作物更耐旱涝、耐肥瘠、耐寒燥,特别适于在山区种植,所以咸丰时期其种植已经普及到了山区。如兴义府,史载:“包谷,今全郡皆产,全郡多山,包谷宜山,故种之者,较稻谷为多……郡之贫民,多以代谷。”^{[16](卷四十三《物产志·土产》)}再如安顺府,史载:“近年山土多种包谷,早者二月布种,六月即可收成,较之高梁、小米、豆可早月余,安郡谚语谓:六月七月为青黄不接,今青黄不接在二三月矣。盖以前山土未辟,所恃者田

禾之成熟而已,六七月未熟故谓之青黄不接。比年多种包谷,贫民可以接济。”^{[17](卷十四《地理志·气候》)}

番薯也是一种来自域外的农作物,贵州大约在清乾隆时期开始种植番薯,如史载松桃直隶厅“栽桐、茶诸树及种包谷、番薯等物,男女共之。”^{[18](卷二十《松桃直隶同知》)}兴义府一带“高山陡岩宜种包谷,平地宜种红薯”。^{[18](卷二十七《兴义府》)}道光时期,在一些地方番薯甚至已经成为重要的作粮食作物。如贵州北部的遵义府,史载:“甘馑俗呼韶薯,声之转。有红、白二种。山农广种者收多至三四十石,即煮以当粮,亦可碎切和米作饭。”^{[4](卷十七《物产·甘馑》)}还有思南府,史载:“番薯,红白二种,居人广种以左餐餐。”^{[19](卷三《食货门·土产》)}据此估计,道光时期贵州的番薯种植已经比较普遍了。

域外农作物马铃薯在贵州的种植,大约始于明清之际,清中后期种植已经较普遍了,如道光时期大定府已经种植马铃薯,^{[20](卷四十二《食货略第四下·经政志四·农桑》)}同治时期毕节县已经种植马铃薯。^{[21](卷七《物产志·物产》)}清末,马铃薯已经成为贵州人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,如湄潭县:“山坡上土多石少,气候无殊。平地可以种苕麦、包谷、蕃熟、黄豆、洋芋之属以佐饔飧。”^{[22](卷一《天文志·气候》)}

本土杂粮及域外农作物玉米等在贵州的推广,极大地促进了山区的农业开发。对此,史载:“大约上田宜晚稻,中田宜早稻,下田稻旱粘。山坡饶确之地,宜包谷、燕麦、黄豆,而红稗、水稗、春荞秋荞皆次之,亦有种小米、红麦、绿豆、芝麻者。”^{[18](卷一《贵阳府》)}再如,普安直隶厅境内崇山峻岭,极不利于农业生产,史载:“厅境山重岭复,鲜平壤,山多大山,岭多峻岭,能兴云吐雾,故多云多雾,云多雨雾多,阴故多。阴多雨,阴则寒,雨则寒,故多寒。”^{[23](卷一《天文·气候》)}因此,如前所述,乾隆时期当地山区少数民族尚以畜牧业为主,但光绪时期已经普遍种植了域外农作物和本土杂粮。对此,史载:“阖境多杂粮,鲜稻谷。杂粮中首包谷,次薯,次荞麦、洋芋,故民间多食杂粮。”^{[23](卷一《天文·气候》)}

四、结论

明代,贵州农业生产还普遍较落后,不仅几

乎不使用牛耕,而且有些少数民族尚处于渔猎业阶段,甚至在数量有限的移民进入贵州之初,由于受当地特殊地形、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曾一度实行较落后的农作方式。

不过,随着移民的持续增多,明清时期贵州农业生产最终既出现了量的扩张,又发生了质的变化,从而彻底改变了原先落后的农业生产面貌。首先,水稻在河流沿岸等海拔较低地区的普遍种植,本土杂粮及玉米等域外农作物在山区的推广,属于量的扩张。其次,随移民而传入的牛耕等内地农业生产技术,使贵州的农业生产水平普遍提高,则属于质的飞跃。两者结合的结果,形成了贵州灌溉便利的河流沿岸等低海拔地区普遍种水稻,无法灌溉的高海拔山区则普遍种杂粮这种立体式的农业生产格局。

[参考文献]

[1](清)王粤麟,等修.乾隆普安州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2](明)谢东山,等修.嘉靖贵州通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3](明)郭子章.黔记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4](清)平翰,等.道光遵义府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5](清)余泽春,等.光绪古州厅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6](明)沈庠.弘治贵州图经新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7](明)洪价.嘉靖思南府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8](清)蒋深.康熙思州府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

2006.

[9](清)何天衢,等.雍正安南县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10](清)易辅上.光绪安南县乡土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11](清)黄培杰.道光永宁州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12](明)高廷愉.嘉靖普安州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13](明)陈以跃.万历铜仁府志[M].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2.
[14]清实录·世祖章圣皇帝实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[15]清实录·高宗纯皇帝实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[16](清)张鎰修.咸丰兴义府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17](清)常恩修.咸丰安顺府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18](清)爱必达.黔南识略[M].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2.
[19](清)修修恕,等.道光思南府续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20](清)黄宅中,等.道光大定府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21](清)王正玺,等.同治毕节县志稿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22](清)吴宗周,等.光绪湄潭县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[23](清)曹昌祺,等.光绪普安直隶厅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
责任编辑:施由明